



中国传媒大学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国新闻史 精品课程 2006



助教课件



教学大纲



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模拟试题/习题



学生作业



学生评价



专家评价



课程教案



著作与获奖



实践指导

学生作业

邵程:再看《新青年》攻孔

江沛:小议五四时期新闻宣传活动

吴黎:我看五四时期的新闻思想

王卫红:报界奇才——黄远生

张冬梅:邵飘萍与《京报》

赵怡:铁肩辣手邵飘萍 一简介邵飘萍办报历程

学生优秀习作六篇

再看《新青年》攻孔

班级: 05新闻续本 姓名: 邵程

《新青年》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当年它攻击孔子儒家学理曾一石激起千层浪,历史在沉淀了这么久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看当年发生的这段往事,在陈独秀、李大钊们的慷慨激昂、义正辞严中,我们或许能有些新的收获。

从《新青年》中的文章看,攻击孔教最激烈的且最有影响的要属陈独秀,他先后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复辟与尊孔》等。吴虞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文,批判“孝为百行之本”的旧礼教,认为封建的家族制度乃是专制制度的社会根基。当时同样是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也加入了这场斗争,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反对把孔教列入“宪法”,指出孔子学说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专制政治之灵魂”,并把反对尊孔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观的批判,说明道德必然随时代而进化。现在看来当时《新青年》的主将们无一不想致孔家学理于死地而后快了,只是他们为何要对孔子有如此深仇大恨呢?他们真的是要攻孔吗?

先来看看当年《新青年》为何攻孔?当时事件的起因是由于袁世凯正扮演帝制丑剧,提倡尊孔读经,利用孔子学说作为麻醉人民、拥护帝制的工具。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桥头堡《新青年》势必竭力阻之。而在袁世凯称帝的阴谋破产后,代之而起的军阀继续推行祸国殃民的反动政策。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旧派人物大肆鼓吹孔教,甚至主张奉为“国教”,列入“宪法”。这股思想逆流是思想启蒙运动的严重障碍,因而《新青年》在一个时期内猛烈攻击孔子学说,掀起了后来称之为“打倒孔家店”的浪潮。由此可见,这最初的起因是由政权之争而起,孔家学理只不过是个被利用的角色罢了。而这些《新青年》的主将们实际上也就是借批孔来攻专制体制,这些在后来的史料中都可一见端倪。

吴虞曾被胡适称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但就是这位老英雄在一封致陈独秀的信中曾说道:“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进步文化之发展,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正如文中所言“余焰”是什么,是专制的燃烧物。为什么猛烈攻击孔子,“势也”,形势所迫也,袁世凯为了当皇帝而尊孔,批孔就是大势所迫。这便间接证明了这次批孔运动的最根本动机。而其他斗士们在后来也都对孔子给与过客观公正的评价。蔡元培在1916年12月26日的一次演说中,针对袁世凯和当时的政府把孔子学说当成宗教进行了驳斥:“孔子自孔子,宗教自宗教,孔子、宗教,两不相关。”

1916年12月10日,李大钊在《宪法与思想自由》一文里也提出:“孔子之说,今日有其价值,吾人亦绝不敢蔑视。”在这里李大钊还谈到了有人假借孔子来搞专制,把专制放在后面,让人打不着。说到这不由使我想起最近读过的台湾学者南怀瑾所著之《原本大学微言》中有提到:孔子的思想原本并没什么,只是被封建统治阶级拿来驱奴人罢了。且从南宋开始,孔子之学说便被程颐、朱熹注解后传世成为治世工具,后来的科举制度所采用的皆是程朱学理,近代我们所见所闻也多是此版本,真正孔子的学说却很少有人能明了了。如此说来,新青年批的孔子定然也不是真正的正宗原版了。他们批判的口号虽是孔子,其实他们批判的内容主要是后儒的思想,大部分并不是原始儒家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陈独秀胡适等人并未能看透这一点,完全将“科学”当成为了解救中国出苦海的洋菩萨,加上他们本身的激进排他问题,所以,在反起自己的传统思想文化上是异常激烈的,只是,反传统本身就是一种极其不科学的行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剧!

我们不能否认《新青年》攻孔在当时有它的历史意义,封建腐朽文化应当被摒弃。但完全一棒子打死也不足取,毕竟孔孟之道能流传下来一定有它的道理,中国泱泱五千年传统文化不能就此一笔抹杀,客观辩证全面的学习理解采纳当为正确处理的态度。纵是我们今天再看《新青年》攻击孔孟学说,也该如此视之。

小议五四时期新闻宣传活动

班级：05新闻续本 姓名：江沛

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此终结，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开始。中国新闻事业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报刊，其中以《新青年》为代表。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观念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发起了批孔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在思想上反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反对尊孔复古，要求争取人权、个性解放。《新青年》对封建主义思想观念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它大张旗鼓的批判封建伦理道德，指出封建伦理道德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尊孔必定导致复辟。

针对当时康有为电请北洋政府拜孔尊教以及定孔教为国教的谬论，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宪法与孔教》、《再论孔教问题》等文章，接着，李大钊、易白沙、吴虞等也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批判孔教和旧礼教的文章。

但是，五四时期的排孔开新不仅不同于辛亥革命时期以及民国初年的排孔，也不同于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史上的排孔。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排孔，着眼于政治批判，文化附属于政治，即便是在民国初年也是将孔子偶像作为封建帝制的政治偶像来批判的，这样，对于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孔子之道就没有得到应有的深刻的文化清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不同了。复古与帝制复辟运动来源于政治领域，也基本上通过政治的方式予以最终解决。除此之外，留给人们思考的则是一个深刻的文化话题：孔子之道充当奴役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一而再、再而三地充当帝制复辟与猖狂进攻民主共和的反动工具，其文化奥秘何在？五四时期的评孔批孔当然是如同一些专家指出的，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批孔的深化，但是，这种历史性的深化恰恰来自于评孔批孔的角度转换，即由政治的批判变为集中的文化批判。

对孔孟儒学的拒斥心态，大致表现在盲目地非难孔子本人及误解儒学思想上。这种心理因素，起源于近代“反孔非儒”运动和文革时的“批林批孔”。儒家思想以传统封建社会为物质承担者，而传统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承担者，传统社会的瓦解，致使孔子权威丧失。当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国门后，近代便开始了反孔运动，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思潮、资产阶级革派的民主思潮，以及达到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众所周知，在“五四运动”后，再遭“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劫，这场充满强烈政治目的色彩的“儒法斗争”、“批林批孔”的“文革”运动，使儒学历经空前的厄运。

当然，只有态度的坚决，绝对产生不出深刻的思想。深刻思想的产生，来自于研究问题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运用正确的方法。由于李大钊掌握并运用了唯物史观来破孔子之道，因此，李大钊虽也像陈独秀一样，批判孔学的伦理道德，但是，李大钊比他的战友乃至同时代人都要深刻，因为他探寻了孔学的伦理道德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从而找到了破除孔学的伦理道德的最根本的途径。

陈独秀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将排孔的视觉转到文化上来，以及表现出来的坚韧的战斗精神，不仅影响了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文化新人，而且明显地影响了新文化阵线的他的战友们。

这一时期，声势浩大的批孔运动全盘否定儒家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儒家文化，但在反对封建思想，提倡民主，要求平等自由、发展新文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看五四时期的新闻思想

班级：05新闻续本 姓名：吴黎

时下，有不少人在大力宣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等宣传思想颇为不满，认为当时新文化的先行者在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有失偏颇，对其缺陷过于夸大，即便是当时促进了思想和政治的变革，但也造成了极“左”思潮的泛滥和盛行。

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分析、研究五四时期全盘否定“旧学”、孔孟之道的偏颇；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决不能鄙薄、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学”和孔孟之道所作的功不可没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正确的批判。

试想一下，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过着痛苦的生活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有一个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制度，而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封建思想的最高代表不正是孔子的礼教——他的伦理政治思想。况且当时《新青年》的文化革命的倡导者们，都是从旧营垒出来的，他们深知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给人民带来悲惨的命运，而且他们本身也大都是身受其害，他们是带着对旧社会憎恨的感情投入反抗斗争的。我们又怎么能要求当时参加战斗的先辈都是四平八稳，无过无不及的呢？

举个例子来讲，毛泽东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分析了中国大革命时期正在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反封建的斗争，对于当时被一些人认为“过火”的现象，毛泽东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站在农民方面认为这是应有的“矫枉过正”，他的有名的格言就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当时用“革命不是绣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这种生动的又警策的语言说明对革命应有的认识。毛泽东坚定、严正的革命态度，打击了诬蔑农民革命斗争的反动势力，也教育当时有右倾思想的干部，使农民运动能够健康正常地发展。实践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

那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当时中国的状况，袁世凯想做皇帝，康有为公然向当时的国会提出要把“尊孔”纳入宪法，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孔子思想和帝制的联系。孔子是尊崇帝制，认为君臣之义是不可移易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当然是大逆不道的“犯上作乱”，而袁世凯称帝以至张勋要复辟，倒是合于圣经贤传的了。事实是称帝复辟必尊孔，因为孔子这块招牌，或者说，这块敲门砖对于敲开帝宫的大门是用得上的，这自然更加深人们对孔子伦理政治思想的仇视。这样，批判孔子也就不只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且直接成为现实的政治斗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这样的思想政治空气里，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推倒孔家店”，或者“打倒孔家店”，是不是毫无根据，因而是冤假错案呢？

当然不能这样说。因为孔子的礼教这种伦理政治思想是孔子的根本思想，它和民主主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是不是矫枉过正呢？看来是矫枉过正。因为孔子思想，并不只是直接与封建君主

专制相适应的伦理政治思想。

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是维护、巩固君主专制的封建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是不相容的。这种思想，越到后来便越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严重障碍。“五四”文化革命，首先批判孔子以“礼”为标志，以“三纲”为主要内容的伦理政治思想，实际上也就为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在思想上扫清道路，因此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孔子的思想不只是伦理政治思想，他还有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文艺思想，等等。而且就伦理政治思想来说，也还不是他的伦理思想的全部。如果说，作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是和民主主义敌对的思想，应该彻底批判，彻底葬送，那么对于其他方面的思想，情况便不一样了，需要进行审慎、客观的具体分析。

其实，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在大约到1919年以前这几年，对孔子的批判，火力是猛的但又都是说理的，而且他们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孔子和君主专制的联系这个问题上，他们都没有全盘否定孔子。《独秀文存》第三卷，保存着陈独秀与他的朋友和读者之间的通信，可以看到，陈独秀和他站在文化革命同一战线的同志，对孔子都不是全盘否定的。

陈独秀曾经自己表白：“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这是符合事实的。不但陈独秀，他的同志，也都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把孔子的礼教批倒。陈独秀还说：“即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惟未可以其伦理学说统一中国人心耳。”足见他并不是否定孔子的一切的。最典型的表现是吴虞，他给陈独秀的信说道：“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亦犹是耳，岂好辩哉？”

这信大约是1917年初写的。连这个“只手推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也承认孔子是“伟人”，可见他虽然把孔家店“推倒”，还没有打算让店主“永世不得翻身”。看来，这个店主还有另外的一面，而且也是重要的一面，他和《新青年》的同人还是心里有数的。但在当时的中国，要“推倒”被誉为“圣人”、“通天教主”的孔子，这些人的处境一定不妙。尽管他们的言论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震动，但并不容易为多数人所理解，至于主张复古尊孔的人对他们恨之入骨，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开始时往往只在少数人手里，首先觉醒的分子容易被孤立。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同人被认为是“名教罪人”。

过去几十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使我们看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容易出现“左”，因为这种形势更加深人们对敌人的仇恨，往往使人发生急躁情绪。对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来说，这种情绪更是难于避免的。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发表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便是这种急躁情绪的反映。

此文一开头便这样说：“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的，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的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陈独秀认为，当时非难《新青年》的人有两种，一种本心是爱护《新青年》的，但认为言词太过激烈，害怕《新青年》“在社会上减了信用”，这实际上就是劝告《新青年》至少把批判的调子放低一些，但陈独秀还是表示“感谢他们的好意”。

另一种人是反对《新青年》的。陈独秀列举了反对《新青年》所加的罪状以后，宣告“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便作他的答辩：“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在这里，在一种急躁、愤激的情绪下陈独秀已经不只反对礼法、贞节属于“三纲”的伦理政治思想，而且反对整个“孔教”，也就是反对整个孔子的学说了。而且对旧伦理、旧艺术、国粹和旧文学等等都不加分析，都在反对之列。

压力越大，处境越困难，反拨的情绪就越高，以至失去了冷静，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不过，这种文化批判，是与反封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种批判有偏激、矫枉过正的缺陷，有泼洗澡水连孩子也一起泼出去的遗憾；但它的主要方面是健康的、必要的、正确的，因而值得肯定，不该否定。

如今我们终于可以摆脱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本世纪初这场文化革命运动。一方面我们可以批驳全盘否定孔子学说以及传统文化的偏激思想；另一方面，我们不可以忘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学”和孔孟之道所作的功不可没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正确的批判。数典不可以忘祖，本世纪初那些重要的宣传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尊重。

报界奇才——黄远生

班级：新闻学04续本 姓名：王卫红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一位旅美华人青年正在默默地用餐。突然从背后射过来两颗罪恶的子弹，这位喋血美洲的青年人便是民初时期鼎鼎大名的新闻记者与政论家黄远生。

黄远生其人

黄远生，中国近代新闻记者。江西九江人，原名黄为基，字远庸，远生是他的笔名。1885年1月15日生于“文彩秀发”的书香门第之家。21岁时中光绪甲辰进士，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但他无意仕进，以新进士之资格赴日本留学，1909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回国后现在清政府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脱离官场，从业新闻，成为蜚声于世的著名新闻记者和政论家，是中国第一个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的人，时人誉之为“报界之奇才”。

民国元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勱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因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声名大震，遂有“新中国三少年”之说。后又与刘少少、丁佛言被时人称誉为“新闻界三杰”。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功夫驰名海内外，不但文章流利畅达、幽默敏锐，深受读者欢迎，而且其工作量之大、创造力之盛也十分惊人。他先后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特约记者，同时为《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撰

写。据李传梓《反袁之勇士报界之奇才》一文统计，从他留下的《远生遗著》所收239篇文章，他的通讯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重要任务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段祺瑞等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全国各阶层广大读者的新，将真相告白于天下。黄远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影响的新闻通讯记者。所写新闻作品辑为《远生遗著》4卷，以新闻通讯为主，兼收政论、译文等，于1919年出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通讯集。

黄远生的贡献

黄远生之死所以引起很大的震动，这与其不凡的贡献与极大的社会影响是分不开的。他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但这并不是他所有的历史贡献之所在。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作为以为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而存在的。

他的文化活动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正式中国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这时比起年长一代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几乎都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从19世纪末活跃在时代潮头的思想先驱变为“不进则退”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五四”一代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此时大都尚处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国文化觉醒的突破口，也还未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庞大阵势。旧的已去未去，新的将生未生，黄远生在这古与今、旧与新、中与西转折的焦点时刻，以其奔放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填补了时代的一个空白。这表现在他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启蒙运动。在《忏悔录》一文中他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要改革国家，则必须改造社会，而欲改造社会，最终必须“改造个人”。这无疑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先声。

黄远生死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其影响所及仍然遍布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仅就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提到他名字或涉及他言论的文章不下30篇。甚至有人言，《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黄远生的未竟事业。

邵飘萍与《京报》

班级：新闻学04续本 姓名：张冬梅

邵飘萍，中国新闻记者，报刊活动家，新闻教育家、新闻学者。邵飘萍，名新成，字振清，号飘萍，学名锡康（后改作镜清）。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邵飘萍五岁起即随父在私塾读书，十四岁考取秀才。1906年，他入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学学习。190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返回金华，任金华府学堂国文、历史教员。在大学期间，他受到新思想启蒙，遂萌发“新闻救国”之志，并为此奋斗终生。早年，他曾作为一名反对袁世凯斗争志士，活跃在南方新闻舞台上。他曾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他创办了《京报》，曾在北京大学的新闻研究会主讲新闻采访学，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新闻采访专著《实际应用新闻学》。他熟练地利用手中的一支笔，奋勇拼杀，反对反动的军阀、官僚、政客，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冲锋陷阵。他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1918年10月5日，《京报》在北京前门外三眼井38号诞生了。这份凝聚着邵飘萍心血的大型日报一问世，即体现出敢讲真话的大无畏作风。在题为“本报因何而出世”的发刊词中，邵飘萍写道“民国以来，军阀所为者俱为祸国病民，今则必须国民共起，志同道合，协力除之！”同一天，他还在编辑部亲手书写了“铁肩辣手”四个字。这摘自于明代杨继盛临刑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中的四字，不仅道出邵飘萍的心志，也是他与编辑部同仁共勉的座右铭。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京报》率先报道了有关学生活动的动向，对五四运动的发生起了推动作用。“五四”运动发动起来后，《京报》积极予以配合，用专版进行报道，针对时局，日发评论，以推动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它与全国进步报刊配合一致，揭露卖过政府的丑恶行为，造成强大的革命舆论，有力地支持了五四运动，6月4日，邵飘萍撰写《为学生事警告政府》一文，揭露卖国政府对学生的要求采取敷衍态度，在迫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5月和6月这两个月中，《京报》就发表《外交失败第一幕》、《坚持到底》、《速释学生》、《研究对外之办法》、《再告工商实业界》、《内外交迫》、《日本之野心益暴露》等署名文章40余篇。“五四”期间《京报》的所作所为，使段祺瑞政府恨之入骨。1919年8月，《京报》被查封，邵飘萍被通缉，他不得不化装成工人潜入天津，后转道流亡日本。

1920年秋，段祺瑞政府倒台，邵飘萍回到北京，1920年9月《京报》复刊。复刊后的《京报》，继续评论时政，抨击列强对华的侵略政策和军阀的专制统治，并出“列宁专刊”和“马克思纪念特刊”，介绍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北京影响日益增大的舆论机关。从日本回来的邵飘萍带回了先进的办报经验，并着手集资在骡马市大街的魏染胡同筹建新的报馆。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积极支持反帝反军阀斗争，前此，他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和郭松林倒戈反秦系军阀的行动，因而遭到奉系军阀的忌恨。1926年4月，张作霖率奉军进入北京，邵飘萍即被逮捕，报馆遭查封。4月26日凌晨，邵飘萍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名被押赴天桥刑场，一代报人就此殉难。《京报》停刊。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当年6月，在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女士支持下，《京报》再次恢复出版。汤修慧女士亲自撰写了《京报二次复活宣言》，表达了对继承夫志，前仆后继的决心。汤修慧不愧为以为性格刚毅的女记者，她担任《京报》社长后，自己经常撰写文章，以至《京报》被人称为“夫妇之报”。不久她被选为北平记者联合会执行委员。1937年“七七事变”后，汤修慧女士关闭报馆离开北平，《京报》从此停刊。

《京报》是对开4版的日报，问世一个月，销量即从300多份上升到4000份，最高发行量可达6000份。《京报》堪称当时的京城名报，它的副刊之多，也是与众不同。除了《小京报》、《京报副刊》等，从周一到周六，每天都有不同的周刊，如周一的《戏剧周刊》，周二的《民族文艺周刊》、周三的《妇女周刊》等等。其中由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是旧中国著名的

四大副刊之一。而由鲁迅主编的副刊《莽原》，更为《京报》增色不少。《京报》在新闻业务上有不少改革。其标题和版面的安排都有所创新，新闻通讯和评论紧密结合，标题多行多层次，在当时普遍比较死板的北京报界，很引人注目，对当地当时报纸新闻业务的改革，有较大的借鉴作用。

1949年4月，毛泽东同志亲自批示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铁肩辣手邵飘萍 一简介邵飘萍办报历程

班级：新闻学04专升本 姓名：赵怡

学习了《新闻事业史》前四章，我对邵飘萍印象很深，很敬佩他。查阅了有关他的资料，现以介绍他办报历程的形式表达我对他的敬意。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出身贫寒，从小在金华长大。1899年他只有14岁就考中秀才。1903年进入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青少年时代受到一位比他年长9岁的民主革命者张恭的影响，张恭于1904年创办金华有史以来第一张报纸《萃新报》，邵飘萍正是从《萃新报》获得对报业的最初印象。

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学制三年。同学中有陈布雷、邵元冲，张任元等人。这三年，邵飘萍读到了《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大开了眼界，并被梁启超的文章所深深感染。他开始为上海的《申报》写地方通讯，1909年春，省运动会期间，他还和陈布雷、张任天三人一起，在一个图画老师指导下，办过一张《一日报》，这可以说是他报业生涯的开始。在此期间，他受到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麟等人的影响，和鉴湖女侠秋瑾曾有书信往来，秋瑾殉难前5天还给他这个青年学子写过一封信。1909年夏，邵飘萍大学毕业回到故乡金华，在他的母校教历史、国文。这是他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他在教书之外，主要的工作是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他酷爱新闻事业，对报业怀有特殊的感情，有“新闻救国”之志。他自己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过“因此关系，辛亥革命之岁，遂与杭辛斋君经营浙江之汉民日报。”

1911年，辛亥革命后杭州光复，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杭辛斋（1869—1924），浙江海宁人，1898年，涉康、梁案曾遭清廷拷打，险被杀头。1905年参加同盟会，赴京办《白话报》，因触犯权贵被禁。在报界很有影响）。他知道邵飘萍经常写些地方通讯，两人一见如故，当即聘邵为主笔，共筹《汉民日报》。11月18日，即杭州光复后的第11天，《汉民日报》就出版了，经理杭辛斋、主笔邵飘萍。

该报“以尊崇人道，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尚武之精神，建设完全无缺之共和政府为唯一宗旨”。11天后，《浙江军政府公报》创刊，也聘邵飘萍为编辑（经理马叙伦、总纂杭辛斋）。他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他15年的终身报业生涯。

1912年春，杭辛斋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将《汉民日报》交给邵飘萍一人主持（这时他还兼任《申报》、《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他对时局有着惊人的洞察力，早在辛亥时就对袁世凯有入木三分的认识。他在1912年1月写的时评中即指出：“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

5天后又评论：

“总统非皇帝。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与他人之权。袁世凯可要求孙总统辞职，不能要求总统与己。”

他以一个独立报人特有的敏锐，发表了大量短小、深刻、具有预见性的时评。不幸的是，全被言中了。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就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至袁世凯。他仗义执言，毫无顾忌地抨击当局：“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并声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斫”。

1913年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乱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邵飘萍。他后来自述“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还曾遭到过暗杀。

邵飘萍因为反袁入狱、三进三出，出狱后只得到日本暂避，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同时，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他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

尤其注意搜集海外新闻学知识，1915年10月就开始编著《新闻学》一书，12月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论新闻学》一文。积极倡导新闻救国，为后来回国办报做准备。

“呜呼袁世凯”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他于当月下旬匆忙返回祖国，参加反袁护国斗争。“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执笔。”发表了著名的时评《预吊登极》：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讖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全文共86字，却用了6个“极”字，把“登极”和“极刑”相连，预言“登极”之日，也是“置诸极刑”之时。短小精悍，用语犀利，给民众以希望。他在上海主持三报笔政，坚决支持蔡锷反袁护国的壮举，猛烈抨击袁世凯的罪恶行径。写下了一系列犀利、精辟的文章，如：《吾民不得不去袁氏之理由》、《同迫退位》、《十五省劝退》、《呜呼袁世凯》等，一直坚持到最后的十五分钟。仅据《时事新报》的不完全统计，他就发表了社论36篇、时评134篇。他高举反袁大旗，为扫除专制、重建共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邵飘萍之名遂誉满全国。

“北京特别通讯”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申报》是当时上海第一大报（资格最老、销路最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甚至

不惜冒生命危险。

在短短两年间，他就为《申报》写了200多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都是来自第一线的报道。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有其独到之处，因此才脍炙人口，风靡大江南北。

请看他揭发张作霖1918年2月抢劫政府军械而写的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归来，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消息传来，此当中原多故，西北云扰之时，张督军忽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津沽。当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数惊”。寥寥几笔，就已活灵活现地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也为他自己8年后被杀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他痛感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首创了“北京新闻编译社”，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发稿。对此，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国人自办通讯社，起源于北京，即民国5年7月（应为8月），邵振清所创立之新闻编译社是也”。

《京报》：“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在北京的两年，邵飘萍深深感到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民众，以反映民众的呼声，做民众的喉舌。而当时的报纸几乎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北京时报》是段祺瑞的背景，《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黄报》由张宗昌资助。邵飘萍献身报业已近10年，作为一个独立的报人，他是多么渴望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啊！

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的提出了他的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一开始只有他和潘公弼两个人，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邵飘萍从此走上一条自资独立办报的艰辛道路。其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排除各种干扰，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取自明确因反对奸臣严嵩被残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将“妙”字改成了“辣”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他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80多年前，他就是在这些思想支配下，把《京报》真正办成了人民大众自己的喉舌（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返回